

---

## 苏联经济改革的试验地

### ——爱沙尼亚

---

如果说苏联经济改革存在先行者的话，爱沙尼亚即是。这个拥有150万人口，有着斯堪的纳维亚效率观念的波罗的海小共和国成了一个有效的实验室。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阿甘别吉扬在最近的谈话中对该共和国

的试验表示赞赏，爱沙尼亚的实践使他很想看到改革将遍及苏联其他地方。

爱沙尼亚是苏联各共和国中唯一的一个正在进行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改革的共和国，改革包括家庭承包，消费品的直接销售以及更多的物质刺激。

也许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或可能是因为爱沙尼亚象苏联其他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实行中央计划的年头比苏联其他地方要短一些。因此，地方积极性在改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在爱沙尼亚农业和服务业管理体制的改革都是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央设计的工业改革中，爱沙尼亚成功地争取到包括零售商业，并允许生产企业设立自产自销商店的试验。

与苏联绝大部分地区相比，爱沙尼亚农业改革的成效是最显著的。1985年，该共和国农业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达到260卢布(相当436美元)，超过了当地工业部门职工月平均215卢布的工资。爱沙尼亚的年收入为全国平均数的2.3倍。与苏联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相反，这里是典型的从城市向农村迁移。

出现这一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爱沙尼亚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农业管理的改革，在当时是第一个组建农工综合体的共和国。目前，这一方法已在全国推行。

实行这一制度，不仅改善了计划，而且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建造住宅、商店和学校，从而逐步改变了农村的愚昧落后。爱沙尼亚社会科学院的奥列伏·卢格斯认为，一个不足之处是农机制造业和化肥厂仍然被排除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综合体以外。

爱沙尼亚现在正在拟定一个新的计划：采用级差农业地租，使土地好坏相异的农户（农场）享有同等的财政条件。科学院专家解释说，为了适应农产品固定批发价格制，幅员广阔的苏联被划分为三个地带。既然不能实行有差别的农产品价格以反映那些地区地理条件的差异，就应当采取级差地租形式。由于采用这一形式会引起食品价格上升从而遭到消费者的强烈反对，因此，在目前，这一设想从政治上讲仍然是难以实施的。

安德罗波夫执政后期开始的全国性试验实施后一年多时间，爱沙尼亚的轻工业系统试行新的奖惩制度已经受了考验，塔林的玛雷特纺织公司初见成效：1985年该厂劳动生产率提高18.6%，而计划为10.5%。

新的制度使顾客拥有更多的权利对生产企业进行监督。去年玛雷特厂为处理顾客对包装的意见支付了70万卢布的罚金。但是，这也要求减少一些生产指标，并让工人支配更多的经济收益。

玛雷特厂的人事部主任爱莉·鲁宾说，她正盼望得到莫斯科贸易部的批准，让爱沙尼亚消费品生产公司开设自销产品的商店。

爱沙尼亚试验引起全国大多数共和国兴趣的还有“电器公司”，它管辖整个共和国48个电视机维修商店。过去的旧制度规定，工作人员在维修中每赚取一个卢布，本人只能得到35个戈比，结果有许多人只好靠兼职来提高收入。而采用新方法，允许工人在完成一定的指标

后，多劳的所得全部归个人，这一方法已在“电器公司”下属的 24 家商店实行。

该公司的总经理里克说，试验结果表明，原来需要 10~14 天才能完成的修理工作，现在只需化上 2~3 天。商店还增加了服务形式，如维修工到居民家上门服务。

里克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他得到共和国计划员的同意，使他的公司在 1986~1990 年期间的生产指标稳定在增长 60% 的水平上。他说，按过去惯例，每年计划指标逐年上升，这样就无法使工人得到实际利益。

“电器公司”经理向最近到塔林视察的阿甘别吉扬汇报时提出，在服务行业是否真的需要指标？服务行业的唯一目标是使顾客满意。他说他能预料服务业一旦取消指标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边契据《南华早报》(86.4))

---

(上接第76页)

人口普查资料和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中关于专家的数量统计材料差距较大。按人口普查资料，1959 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为 377 万 8 千人，而按专家登记材料为 323 万 5 千 7 百人；按人口普查资料，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专家为 787 万人，而按专家登记资料则为 478 万 1 千 1 百人。1970 年的人口普查资料中的专家数量同样高于“国民经济计划集”中的统计数字。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如下：第一，中央统计局进行的专家统计只包括做专家工作的人，而人口普查资料中则纳入所有的专家，其中有退休者、军人、党、共青团和其他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第二，中央统计局以各企业、机关、组织的报告为基础进行统计，而人口普查资料是根据对个人的询问得出，因此后者的统计数字高些；第三，人口普查资料以 1 月 15 日的情况为准，而专家登记统计 1959 年时是在 12 月 1 日，1970 年在 11 月 16 日进行。

因此，全苏人口普查资料提供的有关知识分子的数量的资料比定期登记专家的资料更为准确。我们在分析六十年代知识分子数量和成分的变化时，专家登记资料作为补充资料，而在研究七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的变化时，专家登记资料成了主要依据，因为 1979 年的人口普查材料未予全面公布。

(赛辛娜系苏联斯科大学系历史教师。本文是她的专著《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苏联知识分子》(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82年)中的第一章第二节：“文献资料”。)